

吴世昌全集

第十三卷
第十四卷

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
罗音室译著

吴世昌全集

第12册

第十三卷 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

第十四卷 罗音室译著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总 目

第十三卷

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	1
------------------	---

第十四卷

罗音室译著	81
-------------	----

附录一 吴世昌教授的学术贡献	304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附录二 罗音室著述目录	333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编后记	345
-----------	-----

第十三卷

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

目 录

思想复员论	5
中国青年运动的周期	12
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	18
中国需要重建权威	23
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	33
中国文化与民主政治	41
论学术道德	45
论近十年的教育政策	53
论重点教育与留学政策	57
现代国家的道德基础	62
论存储反应	68
附录 关于“军与民的社会地位”	75
编后附记	79

思想复员论

一

抗战八年,中国除了沦陷全世界被侵略国中面积最大的土地,死伤最多的军民,损失最巨的物资以外,另外还有一种精神的损害,却不大为一般人所注意,然而其影响之大,后果之严重,足以妨害下一代的建国工作,乃至对于世界和平的贡献。物质和生命的损失是看得见算得出的,正如一个人割了一只手,炸了一条腿,创痛巨深,人所共知;精神的损害则像神经失常,貌似健康,实同瘫痪,一切工作,都受阻害。现在复员工作之如此麻痹,内战危机之如此迫切,虽即谓之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战中所受精神损害之自然结果,亦不为过。而展望中国前途,照理讲应该无限光明,事实上则满目忧患。在日本投降之前我们若作此言,必且被目为杞忧,但在今日,则即使最乐观的人,也不敢认为这是耸听的危言了。

战后第一件事是复员,该复员者,从交通、金融、教育、军事说起,头绪纷繁,手忙脚乱;但很少有人谈到思想复员。莫非抗战八年,中国人的思想原封未动,或者今后建国,依然须要战时思想(好不好对不对是另一问题),无需改变么?

说到思想复员,当然包括大后方和收复区。收复区又包括台湾、东北,受敌伪奴役自五十年至六七年不等,在复员以前还要消毒,问题颇多,可以另成专论。然其最后复员,仍当以抗战根据地的大后方为蓝本,为标准。所以本文所论,仍以大后方的思想复员为限。

复员不是复原,应该更进一步,更加积极。中国战前的一切措

施,在准备抵抗侵略,今后建国,范畴不同。目标既异,性质亦殊。若只恢复到战前状态,不仅不够,亦且不可。然在复员过程之中,也许还须经过战前这一个阶段。所以也不能不附带说到战前的情形。复员的目标,不能不顾及今后世界的大势。一切工业、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的建设无不如此,而战后世界思想的潮流,则为上列各项建设的指针,尤不可不注意。所以思想复员,是当前中国问题的核心。

二

在这次大战以前,全世界的思想分为二大壁垒:民主与独裁。民主国家崇自由,独裁国家主统制,崇自由故尊重舆论,主统制要统一思想。尊重舆论,故显得意见纷歧;统一思想,故容易事权集中。意见纷歧,则牵制亦多;事权集中,则功效易见。于是急功近利的短视病者,不免大惊小怪,认为民主主义没落了,代议制度失败了,要富国强兵,非独裁不可,非统一思想不可,非管制舆论不可,非这样那样,不足以御侮图强,……若论其动机,也许未尝不由于爱国心切。但这种思想,有一个危险的倾向,也可说是必然的结论,即如果让它发展下去,必然要役奴别人,同时也限制了自己的知识,终于毁灭了自己,与其所预期的得到相反的效果。因为自由是人类的崇高理想,不但现代人要自由,连原始人也何尝不要自由?不但人,连动物也有,哪一只鸟愿意被关在笼里,哪一条鱼愿意被蓄在缸里?违反了现代人类最基本的要求,不管理论如何漂亮,事功如何见效,最后终必害人害己,自招灭亡。试想希特勒,慕索里尼和日本军阀,如果不统制思想,容许人民自由批评其政策,牵制其行动,这次战争也许根本打不起来,又何至于使三个一等强国土崩瓦解,使全世界人类遭这样大的灾难?这些道理说穿了平凡得近乎幼稚,而在当时则多少名流学者,甘于身受奴役,而且为之宣传效力,希望别人又受他们的奴役,而结果如此,岂非人类的大悲剧?自由思想又是文化进步的必要条件,尤其是现代科学的原动力。侵略国家因为要迅赴事功,把自由思想者赶出境外,提倡实用科学,不注重理论科学,以为只要飞机大炮,便可

以统制全球。但是因这次战争而发明的原子弹,却是从原子能研究出来的。原子能理论起于相对论,而相对论发明者爱因斯坦却在战前老早被希特勒赶到美国去了。以德国的科学基础,如果发明了原子弹,可以兵不血刃而雄视全球。这又是统制思想者的另一教训。

中国自五四以后,思想自由本来已经打了一个基础。国民党的改组,国民革命的成功,乃至抗战之所以能造成舆论、推动政府,未尝不是受五四以后思想自由、民智进步之赐,这是谁都得承认的。孙中山先生论到心理建设,也曾指出新文化运动的贡献。而新文化运动中最大特色是英美传统的自由思想,一切哲学、文艺、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的主义理论,都被介绍到中国来,使顽固守旧者自惭寡陋,清末维新者自惭落伍。当时受教育的青年,都已成为这次支持抗战的主要干部。定都南京以后,北平因为不受政治影响,自由研究的风气得以充分发展,使中国学术界逐渐取得国际地位。而全国学生请愿抗战的风气,也起自北平,因此而有“一二八”之役,奠定抗战的军事心理,测定抗战的军力比例。继而有二十四年的“一二九”学生运动,使华北五省、平津二市的伪自治运动减至冀东二十二县。但我们也不能不沉痛指出,北伐以后因为内乱相寻,政府对于思想言论的统制逐渐加强。一方面则复古思想又抬头而得势。一个学者以新史学的眼光做了一部历史教科书,竟被禁止发行。民初北京政府的教育部有胆量制定并公布的注音符号,过了近二十年,已经铸成铜模,反而被禁止应用了。若干省份的长官,自己连一封信都写不通,也要提倡读经,谈古圣先贤的微言大义了。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之无补于富国强兵,早已经用甲午海军来证明,用一个帝国的崩溃来证明,然而许多心存魏阙的名流学者,也居然谈起“本位文化”来了。甚至于许多欧美留学生也不惜借此为终南捷径。这一切,本来可以引起思想界很大的波澜。但因当时国难严重,大家无暇及此。“七七”以后,军事高于一切,急于一切,因军事外交而统制消息和言论,政府有理由,人民也承认。至于思想,则只要不违背抗战国策,是不能也不必统制的,而复古之类,则根本阻碍进步,不仅与抗战无关,而且大有妨害。可是有的人却利用抗战的大帽子来压迫思想,箝制思想,束缚思想,

窒息思想,却大有害于下一代青年的精神健康。现在抗战既已完成,这顶大帽子自不能再被假借。思想的复员,是建设新中国的主要条件,一切复员的总关键。

三

如果说统制思想完全为了抗战的必要,那是没有的事。英美也抗战,何尝有此必要与现象?恰恰相反,争取思想自由是英美这次对德意作战的主要目标和号召力。如果说统制思想与抗战毫无关系,则也不尽然。在抗战初期,确有人迷信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办法,可以谋急功近利,认为统制思想也是必要的。但到后来,却完全变为争取派系利益的一种手段,并且不惜以威吓利诱种种方法来补统制之不足。这都比较因迷信轴心国全盛时代的行政效率而东施效颦,其存心更不堪问了。有的人要统制思想,却由于无知,例如我们常在有些建筑墙壁上看到一条标语道:“纷歧错杂的思想必须纠正”。只要略为想一想这条标语的文理和内容两俱不通,便可以原谅制造这标语者的幼稚了。所有这些,对于这一代的青年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不良影响。

统制新闻言论的对象是出版界,统制思想的对象是教育界——教育比较难统制,于是乎学生就倒了霉。统制必须有个机构,于是乎成立了训导处,成立了导师制。当然,这些制度,表面上是说仿照英国牛津剑桥的 Tutor System,说起来真漂亮,可是天晓得,牛津剑桥的 Tutor 会做中国学校中训导长的工作!可是一针见血的是训导长的资格限制:必须他本身是进过训练团受过训的。换句话说,必须他自己的思想先已被统制得四平八稳,决不纷歧错杂。战时学生来自陷区,受生活压迫最烈,政府设贷金及公费制度,本来是善意,是善举,但是审查贷金公费要看思想如何,还有其他种种见不得人面的条件(随各校情形而不同),清寒学生即使不愿意,亦必违心承认,其苦痛甚于“嗟来”之食。否则不但读书成问题,连生活都成问题。又以公费诱迫学生舍其所好而改习实用科学,还以为是在奖掖人才,试问

人间精神迫害之残酷,更有甚于此者乎?试问妨害国家文化发展之前途,更有甚于此者乎?有人以为:这种办法,意在使青年心智集中于机械工作,免得谈文艺,谈思想,谈社会科学——总而言之,免得谈政治,搞政治,必不得已而欲谈文艺,谈思想,则也替你预备好了一套,即所谓本位文化者是,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,还不够吗?这是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论的复活。这个解释对不对是另一问题,姑且不说。但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,则嬴政所不烧的种树医药等书,相当于现在所谓实用科学,而他所痛恨的诸子百家,则大概是什么什么主义之类。

至于教授的思想虽不大好统制,而其所受的精神迫害也并不太少。平日因受生活压迫,设备限制,无法作研究工作,已是很大的痛苦;眼看着国家的危急,政治的不清明,而腾不出料理油盐柴米的时间来考虑国家问题,即使想到了,要说话,而其社会地位已为豪华的国难官商所掩蔽,不像战前那样有效力了,而对于国事又看得比较明白,有骨鲠而不能吐,这是何等痛苦!并且据我们所确实知道的,有的教授学问极有地位,却被指为有“思想”问题而解聘。而战时各校校长之更动频繁,又是另一种妨害学术文化的因素。最后,我们也没有忘记学校里的派系倾轧,党团侵入,对于教育界是怎样大的一种罪孽,对于思想界是怎样大的一种威胁。大学如此,中学更不必说。

当然,这种情形,在湘桂之役以后已见改革,以前也并非全国如此。大体说来,有历史的学校,在渝、蓉、昆的学校,比较能保持正常传统。至于在僻远省份学校,则其情形恐怕有甚于上文所述者。学生看鲁迅的书,可以被指为危险分子,而佩“自卫”手枪出入者,可以雄视全校,睥睨一切。至其思想之枯窘麻痹,则令人几难置信。许多学生作起文来,只能搬弄“党员守则”即“青年守则”的文字,因为其在中学时代所受“训练”,说话越此范围即被目为思想欠“纯正”。

若要列举抗战以来教育界所有这类事情,真是更仆难数。我们指出这些事实,也知有的前已纠正,有的已因抗战结束而撤消(如新闻检查),并不是要算旧账,也不是什么“前事不忘,后事之师”之类,却是因为思想一经束缚,恢复非朝夕可致;而且今日二十岁左右的青

年,其受制在若干年前,当时尚未成年,当谈不到思想,而一经先入为主,以后恢复尤不容易,而今后三十年建国的重荷,却正落在这一代的肩上。这是一个何等严重的问题!

离开学校,来看社会,这几年的抗战,在一般人思想上烙印打得最深的,我觉得是一个“训”字。中国据说以儒教立国,但我不记得六经上究有多少“训”字,其意义是否和现在一样。而现在则受训、训练、教训、训示、训话,(不错,还有精神训话。因为某校学生曾有警句曰:不怕飞机轰炸,只怕精神训话。所以令人特别记得)一碰就是“训”。在以前,“不足为训”四个字是连在一起的,而司马迁所谓“言不雅驯”之驯则是马字旁,与此无关。最近的联想,只有满清时代小城市里的地保有时奉命要讲“圣谕广训”,讲完了说一个故事散场,这个训字的传播,我想中央社最有功劳,因为并世任何国家长官讲演是讲演,而在中国则即使是校长科长,一旦讲演而记成新闻,必定变成训话。外国人的教练(Couch)、练习或锻炼(Train)、学习(Learn),一翻成中文,也就一律变为“训”练、受“训”之类。甚至于外国职员见高级职员,明明他们自称为访(Call, Visit),也一定要译成“谒”。只有一个“奉谕”的谕字,还没有送给洋人。呜呼,侧媚之风,至今极矣!中国的精神文明已经光被四表,格于上下,谁谓人心不古,吾道其衰乎!然而据说所谓民主国家也者,官吏是人民的公仆。岂有公仆向主人报告其职务有关的事情,应该称为训话的?二千年前的“人之患”据孟子说是“在好为人师”;今日之患,将非在好训人乎!

四

在抗战期间,政府为军事、外交机密而统制新闻和言论,自有其必要;甚至统制思想,人民也都原谅容忍了。现在战事既经结束,自应开放言路,培养自由思想。中国如今已经挂上了国际民主列车,不论她能否或愿否民主;不但挂上,而且要时时刻刻提防脱节。否则便不能建国。这个道理既微妙,亦简单;可以说,但也无须说。现在谈思想复员,而思想在各人脑中,我要解放,谁也不能制止,不必也不能

请人代拆代行。复员不是复原,当然更不是复古。中国要建成一个自由国家,国乃人之积,非自由的人民,如何能变成自由国家?中国要建成现代国家,没有自由思想,如何能研究科学,发展文化,变成现代国家?中国要建成民主国家,人民自己如果不愿作主,懒得作主,甘居下贱,国家如何会变成民主?思想复员不必登记,也无黑市,思想必须迅速复员,因为中国已经挂上现代国际的自由民主列车,万一复员不够迅速,列车脱了节,弄得不好,出了轨,那才要倒五千年精神文明之大霉!

中国青年运动的周期

一

中国的青年运动，可说自有史以来，即迭相起伏。夏殷二代，民智初启，文献不足，比较详细的记载，起自《春秋》；而《春秋》的作者孔子，仕进则握舆论的权威，退休则招集青年，做种种启发文化，批评政治的工作。这个“不知老之将至”的青年，虽无土地而有群众，其影响历数百年不衰，至汉高祖之再度统一，而邹鲁之士犹凜然不可侵犯，后人遂尊他为“素王”。“素王”者，用现代的话来说，是群众运动的领袖，在野党的党魁，他对于当时的政治人物，少所许可，连对管仲也毁誉参半，惟独对子产最为佩服，因为子产最尊重舆论，最爱老百姓。由于他的建立民主的政治批评，遂有战国末年的“处士横议”。当时好战的诸侯当然讨厌这些“横议”，但就整个的民族文化而论，这些横议无疑的是有贡献的。而那班“处士”——换句话说，尚未执政的学生，也毕竟因为有青年的求进步的热忱，所以才有“横议”。孟子是孔子的私淑弟子，所以他也比较有民主的思想。

二

以中国的整个历史看来，大概国势强盛，政治清明的时代，人民安富尊荣，自然不会发生什么运动。即使有，也只限于纯粹学术方面，与政治大抵无关。所以汉唐盛时，至多只能产生贾谊的痛哭太息，裴枢的高标清流，而鼓不起运动来。战国以后，历史上最大的青

年运动发生过两次：一次是东汉末年党锢事件，一次是北宋末年的太学生运动。前者的领袖李膺、郭泰等想把政府从宦官的腐化和专横中救出来，后者的领袖陈东等在外寇压境的危急时期力排和议，要求政府罢奸相蔡京而任在野的主战派李纲。由于桓帝灵帝的昏聩，郭泰等在政治上失败了，他的党徒杜密等进了宦官的集中营受非刑拷打，范滂等被切下脑壳，后来索性把成千的青年学生推入水中，说把这些自称“清流”的人物扔到浊流中去罢——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“自行失足落水”的妙语。但是腐化的宦官，也终于烂完了四百年的“汉业”。徽钦二宗比较有点知识，采纳了陈东的建议，虽然仍不免靖康之难，但却振起有宋开国以来的文弱之风，建立抗战的精神，支持了南宋的半壁河山。高宗因为自己想在杭州苟安一时，不听宗泽建都南京的建议，又把陈东杀了，但后来他良心发现，后悔不迭，又给陈东封墓赠官。故如以这班青年运动领袖的个人而论，或不免一死，但中华民族的气节和忠义的基础，却是他们奠定的。使后之执政者对于无权无勇的书生的言语，不能不有所顾忌而时时警惕，也是他们的功劳。

此外如东晋的羌胡南侵，按理说也该有青年运动。但因为东汉末年那次的大屠杀，把青年人杀怕了。在思想方面，佛教的消极主义和老庄的无政府思想又合流起来，使知识分子多倾向于逃避现实，而最大的原因，是因为政权操诸少数贵族阀阅，平民毫无发言机会。岂但平民，连知识分子都毫无办法，所谓“世胄躋高位，英俊沉下僚”。少数人把持政权，是走向亡国的特效药。所以南朝此起彼仆，政府如同传舍，北朝的中原旧族，竟至教其子弟受学鲜卑语、习弹琵琶的汉奸训练而不以为耻。东汉阻害青年运动的流毒，竟至于此！

明代因为已经有了陈东的大学生干政运动作基础，知识分子见到政治腐败，就比较的不甘袖手了。明末的东林复社，颇有东都余风；读书不忘救国。但是魏忠贤的集中营——东厂，比起东汉的监狱来还要残酷毒辣，国家亡了一半，马士英还要努力打内战，勾结奸阉余党阮大铖来捕杀青年学生，以图巩固其政权。当时稍有气节的知识分子，给前魏后阮杀逐监禁，弄得一干二净。结果，自然只好让崇

桢太息“君非亡国之君，臣皆亡国之臣”，只好把“不爱江山爱美人”的福王送给敌寇，刺出血来做“福酒”喝！

三

本文所讨论的青年运动的周期，只限于近代。上文不过略举史实，作为借镜，所谓“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”。近代的青年运动，大都是由外患逼出来的。最早的戊戌政变，便是一个例子。在满清的积弱之下，光绪虽想励精图治，但是旧势力太深固了，几个书生敌不过昏后那拉氏的党羽爪牙，徒然牺牲了一批青年，禁锢了一个天子，招致了后来八国联军之入京。于是革命党人才知道改良主义之无补于大局，始有民国的肇建！所以辛亥革命，也可以说是以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的民族青年运动。而压迫青年运动者之终必覆亡，又得了一个血淋淋的教训。

辛亥革命成功得太快了，出乎意料之外地早熟。那是由于袁世凯自私的诡计，所以他便靠从满清承袭来的尸居余气，把革命青年压迫到西南一隅，盗移国柄。他虽然终于倒了，但是承继他这系统的北洋军阀，无他的雄才而有他的腐化，使中国即使以欧战战胜国的地位而独不能取得国际的平等待遇，于是乎实际上在签定二十一条，接洽西原借款时就酝酿着的民众运动，便借欧战结束的时机爆发起来，这就是所谓“五四运动”。结果是中国在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签字，山东问题悬而未决，遂有后来的华盛顿会议，九国公约。日本之怀恨美国，也怀胎于此。这个运动以外交的、政治的开端，扩展到文化的、思想的、文艺的，支流颇多而力量也随之分散。到了后来，几乎完全丧失了他的外交性与政治性，纯粹向学术文化方面发展，——这方面的贡献之大，史无前例，但是注意实际政治的人，渐渐的减少了对它的兴趣，而它也不再具有政治作用。遂使军阀政治的腐化，外交形势的恶劣，日益加深。于是埋头于政治工作的青年，发动了“五卅”运动。

“五卅”运动的文化意义不如“五四”，而其政治的、经济的价值则远过之。此在参与“五四”运动的前辈，或许不承认。但事实是如此：